

文艺创作不仅要有当代生活的底蕴，而且要有文化传统的血脉。“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如果“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把作品在国外获奖作为最高追求，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东施效颦，热衷于“去


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那一套，绝对是没有前途的！事实上，外国人也跑到我们这里寻找素材、寻找灵感，好莱坞拍摄的《功夫熊猫》、《花木兰》等影片不就是取材于我们的文化资源吗？中华民族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和形

成了独特的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有崇仁爱、重民本、守诚信、讲辩证、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有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正扬善、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传统美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很多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永不褪色的价值。我们要结合

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中华美学讲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讲求言简意赅、凝练节制，讲求形神兼备、意境深远，强调知、情、意、行相统一。我们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

传承中华文化，绝不是简单复古，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摒弃消极因素，继承积极思想，“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摘自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15日）



本栏目主持人:刘少华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的故事①

中央文史研究馆是毛泽东主席亲自倡议设立的、具有统战性和荣誉性的文史研究机构。受聘

者都是耆年硕学之士、社会名流和专家学者。今年恰逢国务院参事室（与中央文史研究馆合署办公）成立70周年，本报记者采访了多位馆员，听他们讲述精彩故事。

——编者

在联系采访著名音乐学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田青之前，记者没想到，一位年逾七旬的老先生日程安排得如此之满：上研究生的课；参加教师大会；赴山西左权参加民歌节……辗转于杭州、延安、神木、北京、大理间，整个7月，他只能抽出仅有的一点空档时间来接受采访。

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一间堆满书的办公室里，记者见到了穿着白色中式布衣的田青。办公室的空调坏了，略感闷热，但田青丝毫未显出倦意，始终神采奕奕，侃侃而谈。

从将中国佛教音乐带出国门到上电视、做评委，再到致力于挖掘、保护原生态音乐，田青走过许多不同的路，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始终是他一生不改的追求。

为传统文化搭台

从少年时代开始，田青就对中国传统文化格外着迷。“上中学的时候，我非常偏科，整天就拿着一本《楚辞》看。”

在经历了5年插队务农的生活后，1973年，田青幸运地考入天津音乐学院作曲系，1977年毕业后留校任教。成为一名青年教师后，田青十分认真，但在课堂上，他遇到了难题。

田青在学校同时教两门课，一门是中国古代音乐史，一门是西方音乐名作欣赏。西方音乐名作讲起来比较容易，因为大量的音频可以放给学生听。比如讲贝多芬，田青讲上十几分钟，再给学生们听半个小时《第五交响乐》的原作，一堂课很轻松过去了。但讲中国古代音乐史就困难得多。为了备课，田青要查阅大量的资料，但讲起来依然很费力。“我讲的都是古籍上怎么说，诗词里如何描写音乐，但中国古代的音乐没有音频保存下来，也没有精确的记谱法，学生们听不到，就无法形成直观感受。”

从此，田青开始琢磨如何能找到活着的古代音乐。他想到宗教的变化相较于时代变化来说是比较缓慢的，那么宗教音乐中会不会保存了古代音乐的特征？寺庙里的各种仪式都离不开音乐，自己可不可以去寺庙的高墙里找到自己想要的乐曲？抱着这样一个想法，田青研究起了佛教音乐。

在上世纪70年代末，国内没有人专门做佛教音乐研究。田青自己揣着300元，背着一个破录音机、一壶水和一只装着书和干粮的绿书包，睡在火车的座位下面，独自前往五台、峨嵋、九华、普陀、敦煌等地造访寺庙。他坚信，人迹罕至的山野里保存着音乐的珍宝。

同时，田青大量翻阅佛教典籍和历史文献，寻找蛛丝马迹。“我需要看的这些古籍，在那个年代，图书馆都是不外借的，只有拿着内部借阅证才能看到。我想方设法弄到了一张天津图书馆的借阅证，每天坐在图书馆的古籍部下笨工夫抄书。像《高僧传》《续高僧传》等，只要和佛教音乐有关的内容，我都一个字一个字地抄过。这让我在许多年后，还能一段一段地背诵出书上的内容。”后来，田青将研究成果写成了自己的硕士论文《佛教音乐的华化》，这也是中国第一篇研究佛教音乐的学位论文，奠定了后续中国佛教音乐研究的基础。

随着在佛教音乐研究上的逐渐深入，上

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田青开始从事《中国佛乐宝典》的辑录工作。10多年间，他走访了一二百所寺庙，在大量调研的基础上收录了30个小时的录音。“参与录音的僧人，现在都基本不在人世了。这么珍贵的资料得以保存下来，已经可以说是一份非物质文化遗产了。”

能花费几十年的心血坚持从事这样小众的研究，田青的心中是有股子信念的。他说，学术研究不能仅仅局限在书斋里，而是要为传统文化尤其是濒临灭绝的传统文化搭台。

一些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田青参加，他就利用这些机会促成中国佛教音乐到世界各地去演出。田青经常带着佛教音乐团去欧洲演出，到过法国、德国、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等。

田青一直十分敬佩自己的老师杨荫浏先生。“杨先生当年把瞎子阿炳的音乐录下来介绍给世界。如果没有他的努力，没有人会知道这样一个靠音乐讨饭吃、身如草芥的阿炳。但因为杨先生，阿炳的音乐留在了文化史上，《二泉映月》也成为中国民族音乐的代表性曲目。”

偶然成了电视红人

除了研究佛教音乐，田青更为人所知的研究领域是中国民间音乐。当说起自己与民间音乐、民歌结缘的伊始时，田青用了这样一个表述：人生的偶然性。

中央电视台举办的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青歌赛”）曾对中国音乐界产生过巨大影响。原本，田青的书斋生活跟这样的综艺节目没有什么关联，但在第九届青歌赛上，他为帮朋友的忙，临时成了节目评委。没想到，这给了田青一个近距离观察中国当代声乐界现状的机会。

比赛的复赛阶段，评委们每天要听100多个歌手轮番演唱，把可以参加决赛的歌手挑出来。连续几天的赛程下来，田青发现选手们选择的歌曲范围太窄，一二十首歌曲被翻来覆去地唱。歌手们的发声方法也明显趋同，音色高度同质化。这样的状况让田青觉得很不满意。

到决赛，轮到田青做点评，他就坦诚讲了自己的感受：“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有电视只有收音机。但是我们从收音机里光靠听，就能立刻分辨这是马玉涛、那是郭兰英，绝对听第一句就知道是谁在唱。但今天听了几十个歌手，我听不出他们有什么个性，这个是大问题。”

出人意料的是，这番“得罪人”的发言，播出后得到了观众的热烈反馈。第二天，电视台的电话都被打爆了，观众说，戴眼镜的那个评委讲得好，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这一下子让田青从一位学术专家变成了一位公众人物。

此后，田青开始关注打开国门后中国传统文化中某些精华流失的问题。

“我一直说，古往今来，所有第一流的艺术家人没有一个不对民间艺术持一种尊重的态度。”田青跟节目组提出建议，希望让非学院派、真正来自民间的歌手有机会进入比赛。到了第十届青歌赛，从藏族牧区来的牧民的女儿索朗旺姆获得业余组民族唱法一等奖。



田青近照

季星兆摄



《中国佛乐宝典》

季星兆摄

到了第十二届青歌赛，民族唱法组里单独分出了“原生态唱法”，给成千上万没有机会进音乐学院学习、但一直热爱音乐的普通人创造了机会。后来这一组别中，也涌现出了许多深受观众喜爱的歌手。

“青歌赛把我推到风口浪尖上，但是也激发了我保护传统文化的热情。命运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把对传统文化的这份感情和几十年的积累变成了实践，有机会把自己的理念传播到社会大众当中。”田青说。

盲人歌手让我热泪滂沱

在青歌赛之外，田青也始终致力于为民间歌手提供机会。

2002年，田青到山西左权县参加民歌花戏研讨会。在会上，他见到了羊信石占明。那时，石占明就是村里一个平凡的牧羊人，但天生一副好嗓子，声音高亢嘹亮。一听他唱歌，田青就惊住了。

彼时，正巧浙江仙居县要举办第一届

南北民歌擂台赛，田青当主持。“当时参赛的选手其实都选完了，我就跟组委会说，我这儿有一个羊信歌手，我来做担保，保证唱得好。”就这样，石占明的命运发生了转折。

在上台比赛前，石占明紧张得不知道该怎么唱了。田青鼓励他说，你就还当自己是羊信，也别害怕，底下不管坐着什么人，你就当他们都是羊。就这样，石占明很争气地在第一届南北民歌擂台赛上拿到了金奖，成了“全国十大歌王”之一。

同样在左权县，田青还发现了一支盲人宣传队。“我第一次听到这支盲人宣传队演唱是在一个破庙里。他们从破庙里拉出一根电线，安了一个电灯，把电灯挂在树上，下边摆着一张八仙桌。那是夏天，大家就围着这个桌，听他们唱。歌声中的真诚、沧桑甚至苍凉一下子打动了我。”尽管过去了多年，田青回忆起第一次听盲人宣传队唱歌时的场景，依然很激动。他说：“盲人看不到这个世界，他们没有和观众交流，他们是向天而歌。”

听过左权盲人宣传队的演唱后，田青还

专门写了篇文章《阿炳还活着》，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文中写道：“作为一个以听音乐为职业的人，我已经很难被音乐打动了。但是，那天，在左权，我居然在音乐中热泪滂沱。”“热泪滂沱”4个字，说尽了田青当时所受感动之深。

就在破庙里，田青当即跟盲人宣传队的成员们讲：“我一定要把你们带到北京去。”后来，田青帮盲人宣传队联系到了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在那里，他们举办了到北京的第一次演出。“我现在还记得，县文化局给盲人宣传队成员一人做了一身新衣裳，蓝布裤褂、黑布鞋、白袜子。盲人宣传队坐火车到北京西站后，我想让他们吃一顿好的，就找了个饭店，鸡鸭鱼肉点了一大堆。但我没想到，他们看不见，没法夹菜，怎么吃？我只好找饭店老板，给他们每人盛上半碗饭，把各种菜夹到里面，还要把鱼刺剔掉。我那时才发现，我并不知道盲人的生活之苦。”

带盲人宣传队到北京的舞台上演出，田青把好多音乐界的朋友都请来了。他给这些大腕儿们打电话说：“这场音乐会你必须来，我保证你们之前从没听过，听了以后会被感动。”

演出前，田青向观众郑重介绍了这支队伍。盲人生活不易，但他们不仅自力更生，还在太行山间，一个村一个村地为那些缺乏文艺生活的留守儿童、父老乡亲送去欢乐。“我们的舞台上，太缺少这种没有任何修饰的、完全真诚的、草根的但又有着深厚文化传统的东西了。”田青说。

因为田青把石占明和盲人宣传队带出了大山，村里的百姓们都把田青当成了亲人，左权县龙泉乡龙则村还授予了田青“荣誉村民”的证书。

2013年，田青获聘成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无论是总理给我的聘书，还是龙则村农民们给我的证书，都是沉甸甸的肯定，是在做传统文化保护工作中，我最大的收获。”田青说。

人物简介：

田青，1948年出生于天津。佛教音乐专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文史馆馆员，中国佛教协会顾问，中国昆剧古琴研究会会长，中国艺术研究院宗教艺术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执行副主任。

长期致力于中国民族民间音乐和宗教音乐的研究，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著有《中国宗教音乐》、《净土天音》、《佛教音乐的华化》、《禅与乐》等多部著作，2018年出版九卷本《田青文集》。



本栏目主持人:严冰

“孙子在小区念幼儿园，儿子是楼下超市的保安，媳妇在附近妇幼保健院工作，不管读书还是上班都是几分钟的路，中午还能回来陪我一起吃饭。”在圆梦家苑小区，坐在轮椅上的79岁老人胡根花说。一位老人的只言片语就勾勒出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千岛湖镇的宜居图景。

淳安作为加快发展县，困难群众基数大，住房成了实现百姓安居乐业的头等大事。2003年，淳安建起了第一幢保障房，16年间各类保障性住房已有6550余套，建设总面积达56.1万平方米。另一项工程老旧小区改造也齐头并进，2010年，淳安县启动老旧小区改造提升，休闲运动场地建设6000平方米、绿化修整1.46万平方米，惠及16771户老旧小区居民。

为了让保障房的分配在阳光下运行，淳安县探索了“初审、复审、终审”三级审核以及在社区、新闻媒体“两级公示”制度，确定家庭符合申购条件后，采取统一摇号的方式公布申购对象。截至2019年中旬，淳安县常住人口的住房保障覆盖率达18.15%，近2万名群众实现了住有所居。

原供销社退休职工、83岁的“空巢老人”陈鲜花

房子宽敞了，小区环境美了，物业管理好了
淳安，为“安居梦”增添亮色

杨洁告诉本报，她在琵琶园老社区租房18年，年纪大了腿脚不便，上下楼梯感觉吃力。7个月前，她搬进了崭新的茶园小区，这是千岛湖镇最大的综合性保障房小区，入住了1763户人家。为了方便交通，淳安县政府专门安排13路公交车，从小区出发通往县城的医院、学校、购物商场。她说：“现在环境好了，有了电梯，房子也宽敞了，还有小区的保安定期来看望我，帮忙送水，孩子在外工作也安心了，我觉得生活很幸福。”

保障房小区的物业管理让百姓的“安居梦”也愈加温馨。不少社区把物业岗位留给了社区居民，在实现百姓住有所居的同时，解决了部分困难户的就业问题。社区里活动室、幼儿园一应俱全。针对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住

扑鼻的鸠坑茶还原淳安的老街生活。

在塘边弄住了整整30年的60岁张大伯说：“小区的绿地、公共休闲场地、停车位都增加了。还有居民赋诗一首，题为《赞外立面改造》：家家旧物换新颜，各个市民皆欢笑。”

淳安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何宇富告诉本报，为加大困难群众住房覆盖面，一方面，县里将再投资3亿元，建设约900套保障性住房，让群众住有所居。另一方面，把好“进出口”关，严格审核申报材料，并启动3年一复核的程序，对经济条件转好的群众实行迁出制度，让保障房工作真正做到公平合理。此外，打造“菜单式”服务，业主可根据生活需求在家中自行“点单”，物业串联维修、教育等机构提供上门服务，全面提升小区的幸福感。

正在杭州千岛湖调研的宜居城市专家、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宜居城市与城乡治理专业委员会主任罗亚蒙告诉本报：“淳安县城在保障性住房建设和老旧小区治理更新方面积累的经验，具有典型性、先进性、示范性，可以作为中国宜居县城创建的经验样本。”